

东汉的洛阳狱

宋 杰

提 要：东汉洛阳狱设置在洛阳县官署之内，由司隶校尉、河南尹与洛阳令共同管辖。洛阳狱规模巨大，机构庞杂，兼有中央政府“诏狱”和地方郡县监狱的职能，囚禁的对象包括各级官僚贵族和平民百姓，对京师安全和朝廷政局影响甚重。东汉后期，各方政治势力激烈争夺洛阳狱的管辖权，对政局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东汉 洛阳狱 诏狱

监狱制度是汉代法制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问题较早予以关注的有南宋学者洪迈，他曾指出西汉京师监狱之繁，后代“不至如是其多”。^①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63《刑考二·西汉狱名》、清纪昀等纂《钦定历代职官表》卷13《刑部·历代建置·汉》，^②都对汉朝监狱的复杂种类与内容进行考述。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清末法学名家沈家本的宏博巨著《历代刑法考》，其中的《狱考》和《汉律摭遗》卷6《囚律》，^③对两汉监狱的名目、管理法规及建置的演变进行了翔实的考证，追本溯源，旁征博引，是汉代狱制研究之集大成者。

现代学者对汉代监狱的研讨，往往属于法制断代史和通史著作的某个组成部分，代表有张景贤著《汉代法制研究》第8章，徐世虹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战国秦汉》第19章，内容主要是关于两汉中央、地方监狱的设置，对狱囚和刑徒的管理法规，政府的“录囚”制度等。有关领域的专题论文数量较少，如余行迈《西汉诏狱探析》，沈刚《汉代监狱设置与管理述略》等。^④上述论著的研究内容多属于概论性质。近年来，笔者逐步对汉代各种类型的监狱进行

① 洪迈：《容斋续笔》卷1《汉狱名》，《容斋随笔》（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7页。
②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63《刑考二·西汉狱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8页；纪昀等纂：《钦定历代职官表》卷13《刑部·历代建置·汉》，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01册，第250—251页。
③ 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65—1176、1483—1490页。
④ 参见张景贤：《汉代法制研究》第8章《汉代的司法制度·三·监狱制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61—268页；徐世虹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战国秦汉》第19章《两汉时期的监狱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630—659页；余行迈：《西汉诏狱探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31—38页；沈刚：《汉代监狱设置与管理述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金景芳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8—311页。

个案研讨,已发表的论文有《东汉的黄门北寺狱》、《汉代后宫的监狱》。^① 东汉洛阳狱分属几个司法机构,涉及的政治关系相当复杂,笔者拟在本文中予以剖析说明,望能得到师友指正。

一 洛阳狱的管辖机构

(一) 洛阳令与洛阳狱

洛阳在西汉时为河南郡治,所设之狱即称“洛阳狱”。^②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曾大量裁减机构,京师监狱多被撤销。据《后汉书·百官志二》“廷尉”条本注,西汉时长安监狱有二十余座,东汉初年都城仅保留廷尉狱与洛阳狱。沈家本对此评论道:“世祖省并官寺,狱存二所,而时无废事,因由天下初平,亦政治清明之效。”^③ 从史籍的记载来看,洛阳狱设在洛阳县令官署之内。《后汉书》卷41《寒朗传》载汉明帝时审理楚王英谋逆案,“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第1417页)而《后汉纪》卷10永平十四年则载明帝“自幸洛阳寺,出者千余人。”^④ 可见洛阳狱就在洛阳寺内。汉制,郡守所居官署曰“府”,县令、长的办公机构或称“廷”,或称“寺”,如县寺、官寺,见《汉书》卷12《平帝纪》元始二年(公元2年)四月,“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第353页)《后汉书》卷27《张湛传》曰:“后告归平陵,望寺门而步。”李贤注:“寺门即平陵县门也。”(第929页)洛阳寺即洛阳县令之官署,而洛阳狱设在其中。

“录囚”是汉朝政府派遣官吏视察地方监狱、纠正冤案的一项制度。《后汉书·百官志五》曰:“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注引胡广曰:“县邑囚徒,皆阅录视,参考辞状,实其真伪。有侵冤者,即时平理也。”(第3617—3618页)由于洛阳令是洛阳狱的主管官员,如果犯人收审监管出现重大过失,首先要追究其罪责。史书中常见洛阳寺录囚时发现冤情,将县令逮捕治罪的事例。如《后汉书》卷4《和帝纪》载永元六年(公元94年)七月,“丁巳,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收洛阳令下狱抵罪。”(第179页)卷10上《和熹邓皇后纪》载永初二年(108)夏,“京师旱,亲幸洛阳寺录冤狱。有囚实不杀人而被考自诬……太后察视觉之,即呼还问状,具得枉实,即时收洛阳令下狱抵罪。”(第424页)卷35《张纯附子奋传》亦载:“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阳狱,录囚徒,收洛阳令陈歆,即大雨三日。”(第1199页)

汉代各县令、长为当地行政长官,“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⑤ 每年考课的内容包括社会治安和日常案件的处置。洛阳豪贵云集,号为难理,又是天子驻蹕之地,治安问题尤为重要,以致朝廷在评价洛阳令政绩时,往往将刑狱置于首位。如《后汉书》卷76《循吏传》载王涣为洛阳令,以平审疑狱闻名,“又能以谪数发擿奸伏。京师称叹,以为涣有神算。”又称,“自涣卒后,连诏三公特选洛阳令,皆不

① 宋杰:《东汉的黄门北寺狱》,《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10页;《汉代后宫的监狱》,《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29—49页。

② 《汉书》卷60《杜周附业传》:“定陵侯既出关,伏罪复发,下雒阳狱。”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79页。

③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3册,第1174页。

④ 袁宏:《后汉纪》卷10明帝永平十四年,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9页。

⑤ 《后汉书·百官志五》本注曰,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22—3623页。

称职。”都是因为打击犯罪行为不力的缘故。直到永和年间任峻出任洛阳令后，“纠剔奸盗，不得旋踵，一岁断狱，不过数十”，（第2469—2470页）情况才有所改观。

（二）河南尹与洛阳狱

汉代以郡统县，东汉京畿设河南郡，行政长官为河南尹，治下有21城，20余万户，百余万口。^①按照汉朝制度，郡府为地方最高的行政、司法和治安机构，当地的普通案件一般由各县自行处理，但是遇到疑难案件时，需要上报郡太守、王国相解决，称为“谳狱”。《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汉官》记载，河南尹属下有“案狱仁恕三人”，又称“仁恕掾”，^②负责审理河南郡即京畿境内的重案疑案，并能代表河南尹巡视所辖诸县。对于危及地方安全的重大案件，郡府则直接立案逮捕人犯并进行审判，两汉史籍中多有太守诛戮当地豪强的事例，河南尹这方面的职责与郡国守相基本相同。

洛阳狱虽然设在洛阳令的官署，但因河南尹是其直接上司，又有统领全郡政务和刑狱的职责，所以洛阳狱也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如《后汉书》卷5《安帝纪》载永初二年五月丙寅，“皇太后幸洛阳寺及若卢狱，录囚徒，赐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属以下各有差，即日降雨。”沈家本按：“洛阳寺属河南尹，若卢属廷尉卿，故皆获赐也。”^③因此，河南尹有权拘捕犯人送入洛阳狱，或将狱内囚犯释放。如《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载：“单超、左馆前诣河南尹（梁）不疑，礼敬小简，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阳狱，二人诣门谢，乃得解。”（第2520页）如果洛阳狱的管理发生事故，朝廷也要追究河南尹的责任。如桓帝时杨秉为河南尹，“常侍单超弟匡赂客任方，刺杀兖州从事卫羽，秉捕方系洛阳狱，正其罪。”^④而单匡“密令（任）方等得突狱亡走。尚书召秉诘责……而秉竟坐输作左校，以久旱赦出。”^⑤

东汉京城之内除洛阳狱外，是否另有一座由河南尹直辖的“河南狱”，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学术界的流行观点认为，汉代监狱是按照郡县两级机构分别设置，郡有郡狱，县有县狱。^⑥这种看法可以追溯到清代，汉昀等人曾根据《资治通鉴》卷83晋惠帝永康元年（300）正月条的记载，推论东汉京城应分别设有河南（郡）狱和洛阳（县）狱，由河南尹与洛阳令各自管辖。见《钦定历代职官表》卷32《顺天府表》：

谨案晋依汉魏之制，置河南尹、洛阳令于都城。按之职制，自当以郡统县。然观《资治通鉴》载惠帝废愍怀太子，故臣冒禁拜辞，司隶校尉满奋收缚送狱，河南尹乐广即便解遣，而系洛阳狱者犹未释，都官从事孙琰说贾谧令释之。胡三省注曰：“付郡者，河南尹得解遣之；系洛阳狱者，尹不得与，故未释。”据此，则河南、洛阳各有狱，其在洛阳者，皆令自决遣，并不关白于尹。疑当时洛阳实主诏狱，故其权独重也。（第610页）

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狱考》中亦举《汉书·酷吏·义纵传》所言“定襄狱”为例，指出郡自有狱。又在同书《汉律摭遗》卷6中说：“东京之洛阳狱，即西京之长安狱也”。认为两者性

① 参见《后汉书·郡国志一》，“河南尹”条，第3389页。

② 参见《后汉书》卷25《鲁恭传》及注，第874—875页。

③ 《后汉书》卷5《安帝纪》，第210页；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3册，第1175页。

④ 彭大翼：《山堂肆考》卷64《京兆尹》“捕击任方”条，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75册，第256页。

⑤ 《后汉书》卷54《杨秉传》，第1771页。

⑥ 参见徐世虹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战国秦汉》，第639—640页。张景贤：《汉代法制研究》，第261页。

质相同,而西汉长安令的上级京兆尹在其府内另有监狱。据《汉书》卷76《张敞传》所载,张敞曾令部下收捕属吏絮舜入狱,并将其处死。沈家本按:“敞时为京兆尹,此狱当是京兆尹之狱。赵广汉为京兆尹,亦有捕治送狱之事,见《广汉传》,此京兆自有狱之证。三辅职同,京兆尹有狱,左冯翊、右扶风亦必各有狱矣。”又云:“东京之河南府与西京之三辅同,自有狱。”^①但是,明确记载东汉有“河南狱”的史料仅见《华阳国志》卷10中《先贤士女总赞》(中)“广汉士女”条:

宁叔,字茂泰,广汉人,与友人张昌共受业太学。昌为河南大豪吕条所杀,叔杀条,自拘河南狱。顺帝义而赦之。^②

据此,对东汉河南郡与洛阳县分别置狱之说,笔者尚存几点疑问,提出与诸师友行探讨。

首先,为什么记述东汉故事的诸家正史著作,如范曄《后汉书》、袁宏《后汉纪》,以及八家《后汉书》等,关于洛阳狱记载甚众,却未尝提到当时还有“河南狱”。其次,史籍记载两汉郡太守所直辖的监狱,以郡名为名称者甚少,但是以其郡治所在之县为名称者较多,略举东汉数例如下。司马彪《续汉书》曰:“史弼迁河东太守,断绝书属。中常侍侯览遣诸生赍书请之,并求假盐税。弼大怒,乃付安邑狱,拷杀之。”谢承《后汉书》曰:“桥玄迁齐国相。郡有孝子为父报仇,系临淄狱。玄愍其至孝,欲上谏减罪。”^③《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成瑨字幼平,弘农人。迁南阳太守,时桓帝美人外亲张子禁怙恃荣贵,不畏法网,瑨与功曹岑暕捕子禁付宛狱,笞杀之。”(第1077页)《后汉书·百官志三》注引《决录注》:“(丁邯)迁汉中太守,妻弟为公孙述将,收妻送南郑狱,免冠徒跣自陈。诏曰:‘汉中太守妻乃系南郑狱,谁当搔其背垢者?悬牛头,卖马脯,盗跖行,孔子语。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谢’。”(第3599页)

汉代郡府直辖的监狱多以县名称呼,这种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应该如何解释,1997年在江苏连云港出土的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为回答这个疑问提供了资料依据。记载表明,西汉后期东海郡府不置监狱,其所辖诸县都有监狱,簿中记录太守属下吏员27人、都尉吏员12人,皆不置狱吏;而治下38县之属吏职务与监狱相关者,有狱史与牢监,狱史各县人数多者为2人,少者为1人,有一县不置,最多为郡治所在的郯县,共5人。牢监除五县不置外,其他各县皆置1人。廖伯源先生据此论述道:

郯县属吏不但狱史人数为各县之最,郯县之吏员尚有“狱丞一人,秩二百石”(79—6),盖朝廷命官,且东海郡38县中,仅郯县有狱丞。《汉书·地理志》:东海郡之首书县为郯县(28上/1588),乃郡太守治所所在。各县之重案尚须呈报郡府,郡府或案验重审,为提问嫌犯方便,于郯置较大之监狱。然郯狱丞为郯县之官员,非郡吏,郯狱丞管理之监狱属郯县,郡府不设监狱。此亦秦汉初郡县之行政重心在县不在郡之证据。^④

《东海郡吏员簿》的发现,可以合理解释汉代“郡狱”多以县名称呼的矛盾现象,它表明两汉郡县分别置狱的传统观点可能存在错误。结合各种史料来看,笔者认为汉代郡府虽然有直接逮捕审判案犯的职能,却不单独置狱;在通常情况下,所谓“郡狱”应该是附于郡治所在之县的监

①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3册,第1488—1489页。

②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10中《先贤士女总赞》(中)“广汉士女”,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761页。

③ 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下册,第460页;上册,第79页。

④ 廖伯源:《简牍与制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4—65页。

狱。郡府和该县分别拘捕的人犯关押在同一所监狱之内（或许分设牢房），所以郡治所在的县狱一般规模较大，狱吏较多，主管官吏为“狱丞”，秩位也高于普通县狱的“牢监”和“狱史”。郡府尽管不承担此类牢狱的具体管理事务，但也派遣属吏进驻其内，代表上司施行监察。如《汉书》卷76《王尊传》曰：“给事太守府，问诏书行事，尊无不对。太守奇之，除补书佐，署守属监狱。”颜师古注：“署为守属，令监狱主囚也。”（第3226—3227页）东汉河南郡的监狱设置，应与《东海郡吏员簿》记载的情况相似，即郡府不另设监狱，京城之内的地方监狱只有洛阳县寺中的洛阳狱这一座，郡府与县廷收捕的罪犯皆由这所监狱的狱吏、狱卒管辖。河南尹和洛阳令各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立案并拘捕罪犯，分别进行审讯和处置。如前述梁不疑对宦官子弟的收捕与放纵，还有《后汉书》卷77《酷吏传》所载董宣、周纡等人捕杀贵戚不法奴客之事，都可以作为例证。

能够支持笔者此说的还有以下论据，现存史籍记载和学术界的有关研究表明，两汉政府在县级行政机构里设有负责管理监狱的狱吏，如狱丞、狱史、牢监等；而郡太守的僚属中却没有发现负有这类职能的掾吏，只有担任缉捕、审讯任务的贼曹、决曹，^①所反映应该是当时郡府不设狱，而县置监狱情况。另据《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汉官》记载，东汉河南尹与洛阳令的僚属设置情况也是如此。河南尹员吏927人，其中只有负责调查审讯的“案狱仁恕三人”，并无监管囚犯的狱吏。而洛阳令员吏796人，其中“乡有秩、狱史五十六人”。也表明河南郡不单独设狱，而洛阳县置有大狱，故有狱史多名。

由于这种监狱同时隶属于太守和县令，里面关押着郡县两级司法机构收捕的人犯，因此既可以用县名来称呼它，亦可以用郡名来表示。不过，它毕竟是设置在县令官寺之内，所以习惯上冠以县名者居多。前引史书中提到的汉代“郡狱”，如“定襄狱”、“河南狱”，以及西汉京兆尹下令囚禁犯人之狱，很可能与尹湾汉简所反映东海郡监狱设置的情况相似，实际上也是处于郡治所在之县狱内，而并非由郡府另外设狱。

汉代郡国不单独置狱的另一个例证，就是有时因为地方政区建制发生变更，所谓“郡（国）狱”附设于守相治所以外之其他县狱。例如《后汉书》卷44《张禹传》载其任下邳相，“功曹史戴闰，故太尉掾也，机动郡内。有小讦，禹令自致徐狱，然后正其法。自长史以下，莫不震肃。”李贤注曰：“徐，县名也。《东观记》曰：‘闰当从行县，从书佐假车马什物。禹闻知，令直符责问，闰具以实对。禹以宰士惶恐首实，令自致徐狱’也。”（第1498页）徐县为西汉及东汉初年临淮郡治所在地，其狱兼为“郡狱”。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以旧东海郡之下邳数县为王国，封皇子刘衍。《后汉书》卷50《孝明八王·下邳惠王衍传》载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又“以临淮郡及九江之钟离、当涂、东城、历阳、全椒合十七县益下邳国。”（第1674页）从前引《张禹传》所载情况来看，下邳国扩疆后，其“郡（国）狱”并未设在国相治所的下邳县，而是置于徐县监狱。该狱虽然距离下邳较远，但它原是临淮郡治的县狱，规模应较下邳县狱为大，能够安置更多的囚犯，而且地点在该国境内居中，交通便利，所以仍被兼作“郡（国）狱”，张禹因此将位居郡吏之首的功曹遣往该狱受审。如果郡国单独置狱，那么应该设在守相治所的官署附近，张禹就没有必要舍近求远，让功曹前往徐县听候处治。这条史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郡国不另置狱，而是利用辖区之内条件最适合的属县监狱。

① 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2章（3）“郡国属吏”、第5章（3）“县属吏”，台北：长达印刷有限公司，1997年，第108—146、221—237页；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2编，第2章第4节“郡属吏”、第3章第1节“县廷官吏”，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92—147、170—183页。

(三) 司隶校尉与洛阳狱

东汉的司隶校尉对洛阳狱也拥有管辖权力,《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载此官初设于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第737页)后被罢兵，去节，一度废置。但在东汉时期，司隶校尉的地位获得显著提高，廷议时座次在九卿之上，并设有专席，“每会，后到先去。”从其职权来看，负责的监察范围极广，既针对朝中公卿百僚，又包括畿内河南、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河东、弘农七郡，相当于一州之域，亦称“司州”。蔡质《汉仪》言其“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纠。”^①其次，东汉司隶校尉的职责又类似各州刺史，既不仅限于监察，也兼理地方庶务。《后汉书·百官志四》载其属下有十二从事史，分管辖区内的监察、选举、经济及军事等政务。再次，司隶校尉掌握京师地区的最高治安权力，有权纠举逮捕辖区之内的巨奸大恶和违法官员；拘捕任务由其属下的都官从事(又称洛阳都官)负责，《通典》卷32《司隶校尉》言都官从事史“至为雄剧，主察百官之犯法者”。^②他们收捕罪犯之事例，可见《后汉书》卷30下《郎顗传》：“立春以来，未见朝廷赏录有功，表显有德，存问孤寡，赈恤贫弱，而但见洛阳都官奔车东西，收系纤介，牢狱充盈。”(第1074页)卷63《杜乔传》：“乔故掾陈留杨匡闻之，号泣星行到洛阳，乃著故赤帻，托为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积十二日，都官从事执之以闻。”(第2094页)卷77《酷吏阳球传》：“球既诛甫，复欲以次表曹节等，乃敕中都官从事曰：‘且先去大猾，当次案豪右。’权门闻之，莫不屏气。”(第2500页)

京师地区的司法治安和监察事务，按照常制来说，中央有执金吾、卫尉和御史台、廷尉等部门负责，地方上则由郡县长官分别管辖。但是皇帝深居禁中，对外臣存有疑心，因此特设司隶校尉一职，由其亲信出任，专办重案要案，以便直接控制。正由于这一缘故，司隶校尉具有代表皇帝执行公务的特殊身份，能够行使专断之权，被称为“使者”、“使臣”，如《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蔡质《汉仪》言司隶校尉“入宫，开中道，称使者。”(第3614页)又，《后汉书》卷45《张酺传》李贤注：“司隶校尉督大奸猾，无所不察，故曰使臣也。”(第1533页)

司隶校尉虽然开府理事，但是其官署之内并未设置监狱，其所逮捕的人犯也是投入洛阳狱。如《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载尚书劾奏襄楷“伪托神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洛阳狱”。(第1083页)卷67《党锢列传》载李膺搜捕逃犯张朔后，“付洛阳狱”。(第2194页)卷77《酷吏传》载阳球迁司隶校尉，即劾奏王甫、段颎，“于是悉收甫、颎等送洛阳狱”。(第2499页)司隶校尉对洛阳狱也负有重要责任，如果监狱的管理出现重大过失，或是洛阳令在治安方面犯有罪愆，司隶校尉和河南尹作为上司也要受到牵连，朝廷除对洛阳令治罪外，还要给予这两位官员惩处。例如，《后汉书》卷77《酷吏传》载周纡任洛阳令夜巡时，辱骂犯禁的外戚窦笃，“笃以表闻，诏召司隶校尉、河南尹诣尚书诘问”。周纡后任司隶校尉，“(永元)六年夏旱，车驾自幸洛阳(寺)录囚徒，二人被掠生虫，坐左转骑都尉。”(第2495—2496页)卷4《和帝纪》亦载其事，“(永元六年七月)丁巳，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收洛阳令下狱抵罪，司隶校尉、河南尹皆左降。”(第179页)

如上所述，东汉的司隶校尉、河南尹和洛阳令都对洛阳狱和京师治安拥有管辖权力，分别代表司州和郡、县的司法机构，各自行使职权，负有连带责任关系。京师如果发生重大案件，

①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蔡质《汉仪》，第3614页。

② 杜佑：《通典》卷32《司隶校尉》，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82页。

经常是三位官员同时出动办案，而以职位最高的司隶校尉为首。例如，寇荣以擅去边郡获罪，桓帝下诏缉捕，“司隶校尉应奉、河南尹何豹、洛阳令袁腾并驱争先，若赴仇敌，罚及死没，髡剔坟墓，但未掘圹出尸，剖棺露髑耳。”^① 故太尉桥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玄不与。有顷，司隶校尉阳球率河南尹、洛阳令围守玄家……”^② 不过，若是隐蔽操作的案件侦破或突击逮捕行动，皇帝往往责成司隶校尉单独办理。例如，《后汉书》卷45《周荣附景传》注引蔡质《汉仪》曰：“延熹中，京师游侠有盗发顺帝陵，卖御物于市，市长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诏召司隶校尉左雄诣台对话，雄伏于廷答对，景使虎贲左骏顿头，血出覆面，与三日期，贼便擒也。”（第1539页）卷7《桓帝纪》载延熹二年（159），“大将军冀谋为乱。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第304—305页）

二 洛阳狱的“诏狱”性质

洛阳狱虽然设在当地县令官寺之内，受郡县行政长官统辖，但是与地方监狱相比，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洛阳狱属于“诏狱”，而其他郡县监狱则不具备这种性质。何谓“诏狱”，在汉代习惯用语中，“狱”有二义，其一为案件，如《汉书》卷23《刑法志》载秦始皇，“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悬）石之一。”（第1096页）其二为监狱，如史籍中的“长安狱”、“洛阳狱”等。与此相关，“诏狱”之名亦有以下两种含义。

一是皇帝下诏批准办理的重大案件。如《汉书》卷36《楚元王附刘德传》：“昭帝初，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第1927页）卷53《景十三王传》载江都王建曰：“我为王，诏狱岁至，生无欢怡日，壮士不坐死，欲为人所不能为耳。”（第2417页）《后汉书·百官志二》廷尉“左平一人”条本注曰：“掌平决诏狱。”（第3582页）拘捕或通缉此类案犯的诏书中写出犯人的姓名，称为“诏所名捕”，居延汉简中屡见此类简文，^③ 或简称为“名捕”。与“诏狱”相对的名词则是“庶狱”，即普通的刑事、民事案件。参见《后汉书》卷6《顺帝纪》永建四年（129）正月丙寅诏曰：“朕托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庶狱弥繁，忧悴永叹，疚如疾首。”（第255页）又，卷46《陈宠传》：“周公作戒，‘勿误庶狱’。”李贤注：“《尚书·立政》之辞也。言文子文孙，从今以往，惟以正道理众狱，勿误也。”（第1549—1550页）二是奉诏关押要犯之监狱，这类罪犯往往涉及谋反、祝诅、巨赃、危害社稷等重大案件，由皇帝亲自下诏责令逮捕审理。另有一些案件可能并不严重，但是罪犯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如贵族官僚等，身份比较特殊。按照东汉时期法律制度，“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这些人如果犯罪，有司必须先向朝廷上奏，待皇帝下诏批准后才能立案查讯。这是“诏狱”收审罪犯的必要程序，否则属于违法，当事者要受到惩处。如太尉庞参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杀之。参素与洛阳令祝良不平，良闻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实其事，乃上参罪，遂因灾异策免。有司以良不先闻奏，辄折辱宰相，坐系诏狱。”^④

囚禁奉诏收捕之案犯的监狱即称“诏狱”，表明在汉朝监狱体系中的等级地位较高，居郡县

① 《后汉书》卷16《寇恂附荣传》，第629页。

② 《后汉书》卷51《桥玄传》，第1696页。

③ 参见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2—135页。

④ 分见《后汉书》卷1上《光武帝纪》，第35页；卷51《庞参传》，第1691页。

普通监狱之上。东汉京师各政府机构设置的监狱统称为“中都官狱”，^①即属于“诏狱”。史书所载有廷尉狱，亦称“廷尉诏狱”，见《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卷64《史弼传》等。有后宫掖庭狱，见《后汉书》卷10上《和帝阴皇后纪》，亦曰“掖庭诏狱”。^②有暴室狱，亦作“暴室诏狱”。^③西汉曾有若卢狱，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复置，^④《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注引服虔曰：“若卢，诏狱也。”桓帝时设黄门北寺狱，亦称“北寺诏狱”，见《后汉书》卷50《孝明八王·陈愍王宠传》。还有都内狱，见《后汉书》卷69《窦武传》，^⑤具体情况不详。

洛阳狱也属于“诏狱”，收押朝廷下诏收捕的犯人。《后汉书·百官志二》“廷尉”条本注曰：“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各令长名。世祖中兴皆省，唯廷尉及雒阳有诏狱。”（第3582页）即廷尉狱和洛阳狱，后者亦称“洛阳诏狱”。如顺帝时宋光被捕入狱之事，《后汉书》卷48《霍谡传》载：“有人诬谓舅宋光于大将军梁商者，以为妄刊章文，坐系洛阳诏狱，掠考困极。”（第1615页）袁宏《后汉纪》卷18“顺帝阳嘉四年四月”条则记载为：“时魏郡霍谡舅宋光为人所诬引刊定诏书，系洛阳狱，考讯楚毒。”^⑥又，灵帝时蔡邕入狱一案，《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曰：“于是下邕、质于洛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李贤注引《蔡邕集》则曰：“光和元年，都官从事张恕以辛卯诏书，收邕送雒阳诏狱。”（第2002—2003页）另，《后汉书》卷77《酷吏阳球传》载其光和二年任司隶校尉，“于是悉收（王）甫、（段）熲等送洛阳狱”。（第2499页）《后汉书》则曰：“（王）甫时休下在舍，（阳球）悉表甫罪，奔车收送洛阳诏狱，自临拷之。”^⑦可见“洛阳狱”和“洛阳诏狱”这两个狱名在当时能够互相通用，所表示的应是同一座监狱。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53引周寿昌曰：“凡遣官治狱谓之诏狱，谓奉诏治狱也。”^⑧是说“诏狱”犯人往往由皇帝特遣官员审理，或称“治狱使者”，见《汉书》卷97上《外戚卫太子史良娣传》；“治事使者”，见《汉书》卷88《儒林王式传》。廖伯源先生曾云：“召犯官诣廷尉诏狱，其例在两汉书中多见……既称诏狱，当遣使者主审，廷尉并不必然为审判官。若诏不指定由廷尉治狱，廷尉不得预其事。”^⑨前文已述，洛阳狱三位主管官员当中，司隶校尉具有“使者”身份，在得到诏令的情况下可以审理和监管“诏狱”案犯。但有时皇帝亦会派遣使者进驻洛阳狱，主持某些特殊案件的审讯和监禁事务。例如《后汉书》卷81《独行陆续传》载永平年间，会稽太守尹兴属吏陆续等人因受楚王英谋逆案牵连，“诣洛阳诏狱就考”，续母至京无法探监：

但作馈食，付门卒以进之。续虽见受苦毒，而辞色慷慨，未尝易容，唯对食悲泣，不能自胜。使者怪而问其故。续曰：“母来不得相见，故泣耳。”使者大怒，以为门卒通传意气，召将案之。续曰：“因食饷羹，识母所自调和，故知来耳，非人告也。”……使者问诸谒舍，续母果来，于是阴嘉之，上书说续行状。帝即赦兴等事，还乡里。（第2682—2683页）

① 见《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五年五月丙子诏条李贤注引《前书音义》：“中都官谓京师诸官府也。”（第39页）

② 《汉书》卷77《刘辅传》注引《汉书旧仪》，第3252页。

③ 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册，第325页。

④ 《后汉书》卷4《和帝纪》永元九年十二月“己丑，复置若卢狱官”。（第184页）

⑤ 分见《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32页；《后汉书》卷50《孝明八王·陈愍王宠传》，第1669页；卷69《窦武传》，第2240页。

⑥ 袁宏《后汉纪》卷18顺帝阳嘉四年四月条，《两汉纪》（下册），第358页。

⑦ 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下册，第486页。

⑧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53《景十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25页。

⑨ 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此案是少有的“大狱”，“连年不断，囚相证引，坐系者甚众。”^① 牵连入狱者甚多，故朝廷派驻洛阳狱的使者不止一人。《后汉书》卷41《寒朗传》亦载：“永平中，以谒者守侍御史，与三府掾属共考案楚狱颜忠、王平等，辞连及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朗知其诈，乃上言建等无奸，专为忠、平所诬。”明帝召寒朗讯问，“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后平、忠死狱中，朗乃自系。会赦，免官。”（第1417—1418页）以上二例，可见狱中此类案件的嫌疑人犯皆由使者审讯监护。使者有权调查处罚狱内吏卒在管理上的失误，其奏状能够影响皇帝的最终判决，并对各种事故（如犯人意外死亡等）负责，而洛阳狱的常设官员则不能主持这一案件的审理。

从东汉洛阳诏狱的设置情况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从制度渊源来说，洛阳狱的前身是西汉京师的长安狱，但当时长安狱只是一座地方监狱，不属于“诏狱”。西汉首都的诏狱是廷尉狱和“中都官狱”，如《史记》卷122《酷吏列传》所言：“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② 后者是在中央九卿所辖各种官署之内建立的诏狱，《汉书》卷45《伍被传》载：“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幸臣。”颜师古注：“中都官，京师诸官府。”（第2174—2175页）而京兆尹与长安令所辖监狱，通常只收审畿内郡县的普通刑事、民事罪犯，如窃贼、豪强、违法属吏等等，并不拘押诏令收捕的案犯及朝廷命官。据《汉书》卷71《隽不疑传》记载，始元五年（前82年）有人冒充卫太子诣北阙，京兆尹隽不疑“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廷尉）诏狱。”（第3037页）这就是因为京兆尹所辖监狱并非“诏狱”，不具备囚禁审讯此类重要罪犯的资格，必须移交给廷尉诏狱监押审理。所以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狱考》中认为西汉京师地方监狱不属于“中都官”的诏狱系统。如《汉书》卷76《张敞传》提到收其属吏絮舜系狱之事，沈氏按：“敞时为京兆尹，此狱当为京兆之狱，不在中都官狱之数。”又《汉书》卷90《尹赏传》载其出任长安令，“赏至，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沈氏按：“此长安县狱也，当亦不在中都官狱之数。三辅与中都官，史每分别言之，如中都官徒、三辅徒不相混也。”^③

沈家本此说甚为精辟，但需要补充的是，史载西汉皇帝诏令内除中都官徒、三辅徒、郡国徒之外，还有“太常徒”，即太常卿属下诸陵县狱所囚之服刑罪犯，可见当时全国的监狱组织划为四个分支系统。西汉成帝时改制，太常只管理宗庙祭祀等事务，诸陵县划归三辅管理。这样就压缩为中都官狱、三辅狱和郡国狱三个分支系统，并一直延续到东汉初年。光武帝在位时仍然按照这种方法来划分监狱体系。参见《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五月丙子诏：“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第39页）“（建武）七年春正月丙申，诏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第51页）明帝时将三辅划入“郡国”范围，此后各位皇帝的诏书中只提到“中都官”和“郡国”两类监狱系统，前者是诏狱，后者则是普通监狱，而洛阳狱被纳入中都官狱，属于“诏狱”系统，其地位和性质与西汉的长安狱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其次，东汉诏狱皆在京师，不闻郡国有诏狱，而西汉时期却并非如此。当时郡国发生的重

① 《后汉书》卷10上《明德马皇后纪》，第410页。

②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53页。

③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3册，第1171页。

大案件，朝廷下诏责办之后，涉案的主犯通常要押送到京师长安来受审。如高帝九年（前198年）下令捕赵王及群臣反者，“是时汉下诏书：‘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髡钳，称王家奴，随赵王敖至长安。”^①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②但是关东和关中距离太远，又有山水之阻，往来不便。为了迅速办案，以避免耽误时间或是在押解途中发生意外，朝廷在关东地区的几个郡治也设置“诏狱”，将当地的一些涉嫌案犯就近拘捕入狱，再派遣使臣前往审理。如《汉书》卷97下《外戚传下》载：“（中郎谒者张由）因诬言中山太后祝诅上及太后。太后即傅昭仪也，素常怨冯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验，尽收御者官吏及冯氏昆弟在国者百余人，分系洛阳、魏郡、钜鹿。”（第4006页）这三个郡的治所在西汉中后期皆设有“诏狱”，参见《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久之，（赵）太子丹与其女弟及同产姊奸。江充告丹淫乱，又使人椎埋攻剽，为奸甚众。武帝遣使者发吏卒捕丹，下魏郡诏狱，治罪至死。”（第2421页）“本始三年，相、内史奏状，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鸿胪、丞相长史、御史丞、廷尉正杂治钜鹿诏狱，奏请逮捕（广川王）去及后昭信。”（第2432页）“洛阳诏狱”则参见《汉书》卷45《息夫躬传》：“上遣侍御史、廷尉监逮躬，系雒阳诏狱。”（第2187页）又见卷93《淳于长传》：“上愈疑其有大奸，遂逮长系洛阳诏狱穷治。”（第3732页）

东汉建立之初，取消魏郡、钜鹿等地诏狱，只在京师建立“廷尉诏狱”和“洛阳诏狱”。究其原因，可能是都城移至洛阳，位居天下之中，关东各地押解要犯进京的路程缩短，不必花费原来那么多时间。另外，在京师审理要案便于朝廷直接控制，可以及时了解司法审讯的进展和下达指令。此后，郡县设置的监狱，平常只关押普通案犯，若有“诏狱”案件，一般是将犯人逮捕后送交京师去审讯处理。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东汉郡县监狱也关押审讯过皇帝下诏责办的重案之人犯。例如，《后汉书》卷45《袁安传》载永平十四年，楚郡曾收审过数百家与原楚王刘英谋反案件牵连的犯人。如前文所述，楚王英案件的许多涉嫌人犯被押送到首都，分别囚禁在廷尉诏狱和洛阳诏狱。但楚郡是案发地，牵涉的人众数以千计，如果全部押解到京师，一来兴师动众，过于耗费劳力财力；二来洛阳的两座诏狱也难以容纳，所以只得将重要案犯解送京城，其余人众就留在当地审理。又，《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载，“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第2189页）这实际是命令将曹鸾审讯后秘密处死，但既不便在当地执行，又没有必要跋涉千里送到洛阳，于是采取押解到关中槐里狱处置的办法。此类案件都是偶然出现的，朝廷遣官治狱也只是临时性的措施，所以这些地方监狱没有必要改为常设的“诏狱”机构。

三 洛阳狱的主要特点

洛阳狱属于“诏狱”系统，但和京师的其他诏狱相比较，在机构设置、职能、收容范围和规模等许多方面具有鲜明特征，值得关注。试析如下。

（一）管辖机构众多，能参与和控制司法审判的完整过程

在洛阳狱之外，京师其他诏狱的共同特点是常设管理部门的单一化。例如，廷尉狱是由廷

^① 《史记》卷104《田叔列传》，第2776页。

^② 《汉书》卷23《刑法志》，第1097页。

尉府来治理，若卢狱在少府属下的若卢官署，“有若卢狱令，主治库兵将相大臣。”^① 黄门北寺狱设在北宫禁内的黄门官署，由宦官担任黄门令主管。掖庭狱见《后汉书》卷10上《和帝阴皇后纪》，在后宫少府属下的掖庭官署，长官为掖庭令。暴室是掖庭的分属部门，有丞，“其皇后、贵人有罪，亦就此室也。”^② 若依据《汉书》卷97下《外戚传下》所载司隶解光奏书的内容来看，这两所监狱皆由掖庭狱丞管辖，直接奉皇帝的密诏来处治人犯。上述诸座“诏狱”的监管事务，或由监狱所在官署的长吏负责，如廷尉、黄门令；或由专设的狱令、狱丞负责，如若卢狱令、掖庭狱丞，但都是只有一个常设管理机构，不像洛阳狱由司隶校尉、河南尹与洛阳令分头治理，政出多门。

另外，上述京师诏狱官员的管辖范围比较狭窄，就完整的司法诉讼程序而言，他们仅仅从事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并非介入每个环节。如廷尉负责对狱内案犯的审讯和监护，却无权处治，只能提出拟判意见，请皇帝裁决。中都官诸狱令、狱丞专管案犯的囚禁，审理工作则由皇帝派遣的使者来主持。上述监狱的官员及管理机构大多没有掌握劾奏立案、逮捕以及对案犯实行终审判决与执行的权力（黄门令只对本部门的违法宦官负有举奏和拘捕的职责）。而洛阳狱的情况则明显不同，河南尹与洛阳令是京畿郡县的行政长官，司隶校尉监察七郡，“并领一州”，^③ 他们都要对各自辖区的治安状况负责，所以朝廷赋予的权力极重，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参与和控制案件的全部司法审判过程。例如，他们统领着武装吏卒、监狱和府寺的列曹，除了少数“诏狱”案件之外，可以在管辖范围内（司州、郡、县）自行决定起诉、立案，对犯人进行逮捕、审讯和判决。汉代地方长官在特殊情况下拥有专断诛杀之权，“刺史守令杀人不得奏”。^④ 洛阳狱的三位主官也是如此。像史籍所载洛阳令董宣捕杀湖阳公主家奴，^⑤ 祝良杀中常侍樊丰之妻。^⑥ 《后汉书》卷20 质帝本初元年（146）载梁冀之妻孙寿妒恨美人友通期，“使其子河南尹彻灭友氏家。”（第390页）卷22 桓帝延熹九年曰：“李膺初为河南尹，收（阳翟令张）舆考杀之。”又言：“河内张成，道术士也，知当大赦，使女杀人。李膺为司隶，收成杀之。”（第430页）

综上，洛阳狱同时从属于司州、河南郡及洛阳县三级司法组织，还有皇帝派遣的使者来监管和审讯“诏狱”案犯，其管理机构是京师诸座诏狱中最为复杂的。司隶校尉、河南尹与洛阳令由于兼领监察或行政职务，负有治安责任，在各自管辖范围内掌握广泛的司法权力，且能独断刑杀，这一权势也是其他诏狱官员所不具备的。

（二）兼容“诏狱”与“庶狱”案犯

东汉中都官其他监狱所具有的另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诏狱”的性质单一，不收容普通民事及刑事案件的罪犯，而是以特殊的犯罪群体为主要囚禁对象。一般来说，廷尉狱专门收容朝内大臣和郡国守相，黄门北寺狱通常拘禁“党人”，即反对宦官专权的官僚士大夫，掖庭狱收审有犯罪嫌疑的宫人，暴室狱则关押贬斥的后妃及其亲属。若卢狱据前引《汉仪注》所载，也是以监禁将相大臣为主。

洛阳狱的情况则不同，由于其兼属司州和郡县，在接受“诏所名捕”的案犯之外，还关押

①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注引《汉仪注》，第732页。

② 《后汉书》卷10下《桓帝邓皇后纪》注引《汉官仪》，第445页。

③ 《后汉书·百官志四》，第3613页。

④ 赵翼：《陔余丛考》卷16，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9页。

⑤ 参见《后汉书》卷77《酷吏董宣传》，第2489—2490页。

⑥ 参见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下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10页。

着大量民间平常案件的罪犯,即所谓涉及“庶狱”的犯人。这可以从朝廷政要遇到旱灾时亲临洛阳狱“录囚”的措施当中反映出来。如永元六年七月丁巳,和帝“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未及还宫而澍雨。”^① 沈家本按:“不幸廷尉而但幸洛阳寺,殆寻常狱讼皆归洛阳,不之廷尉也。”^②《东观汉记》曰:“永初二年三月,京师旱,至五月朔。(邓)太后幸雒阳寺,省庶狱,举冤囚。”^③ 这两条史料都反映出和帝与邓太后只是审查洛阳狱内的普通案卷,将有冤情的犯人释放,而不包括罪行严重的“诏狱”案犯。

由于洛阳狱同时具备朝廷“诏狱”和司州郡县地方监狱的多种职能,所以拘禁的罪犯相当复杂,上至贵戚高官,下至贩夫走卒,不像其他诏狱的囚犯那样集中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集团身上。洛阳狱的囚犯除了“编户齐民”,还有以下统治阶层。

1. 百官公卿与列侯。按照汉朝制度,百官公卿犯罪应由廷尉审理,通常被拘禁在廷尉狱,称为“诣廷尉”或“下廷尉”,东汉通常也按这一司法程序处治。但如上所述,由于洛阳狱也属于“诏狱”,司隶校尉拥有代表皇帝的“使者”身份,具备审理此类案件的资格。蔡质《汉仪》言司隶校尉劾奏“封侯、外戚、三公以下,无尊卑”。^④ 例如,太尉庞参“以所举用忤帝旨,司隶承风案之”,被免为庶人。虞诩任司隶校尉,“数月间,奏太傅冯石、太尉刘熹”。灵帝时太尉段熲,“为司隶校尉阳球所见诬胁,一身既毙,而妻子远播”。司隶宣播“以灾异奏免(太尉黄)琬、(司徒杨)彪等”。^⑤ 司隶校尉也能奉诏拘捕审讯将相大臣,《后汉书》记载曾在洛阳狱被囚的公卿有太尉段熲、卫尉蔡质、卫尉阳球、太傅袁隗、太仆袁基等。^⑥ 桓帝诛除梁冀时亦逮捕其宗亲入洛阳狱,其中担任朝廷要职者甚多。^⑦

另外,东汉中央政府的最高司法长官——廷尉如果被控有罪,也要被送交洛阳狱,由河南尹审理。参见《后汉书·百官志二》李贤注引《汉仪》:

正月旦,百官朝贺,光禄勋刘嘉、廷尉赵世各辞不能朝。高赐举奏:“皆以被病笃困,空文武之位,阙上卿之赞,既无忠信断金之用,而有败礼伤化之尤,不谨不敬!请廷尉治嘉罪,河南尹治世罪。”(第3582—3583页)

蔡质对此解释道:“议以世掌廷尉,故转属他官。”因为赵世先前担任过廷尉,犯下罪愆后不便在原来的官署里囚禁受审,故采取回避措施,转到河南尹属下的洛阳狱接受处治。洛阳狱关押列侯事例,可参见前述《后汉书》卷41《寒朗传》所载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受楚王英案件牵连入狱的情况。

2. 地方长吏。司隶校尉的监察职责相当于刺史,对三辅、三河、弘农七郡的太守“以六条问事”。如有触犯相关法令者,即向朝廷劾奏,按照通例是征入廷尉狱,和犯罪的郡国长吏相同。如《后汉书》卷64《史弼传》载其任河东太守,得罪权宦侯览,“遂诈作飞章下司隶,诬弼诽谤,槛车征……及下廷尉诏狱,平原吏人奔走诣阙讼之。”(第2111页)不过遇到特殊案件,

① 《后汉书》卷4《和帝纪》,第179页。

②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3册,第1174页。

③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第205页。

④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第3614页。

⑤ 分见《后汉书》卷51《庞参传》,第1691页;卷58《虞诩传》,第1870页;卷78《宦者吕强传》,第2531页;卷54《杨彪传》,第1787页。

⑥ 分见《后汉书》卷77《酷吏阳球传》;卷60下《蔡邕传》;卷74上《袁绍传》。

⑦ 《后汉书》卷34《梁冀传》:“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骑校尉让,及亲从卫尉淑、越骑校尉忠、长水校尉戟等。”(第1186页)

报奏皇帝批准，即使是司州治外的郡国守相也有可能被收入洛阳狱，由司隶校尉审讯。如《后汉书》卷77《酷吏传》载权宦王甫之子王吉“以父秉权宠，年二十余，为沛相……及阳球奏甫，乃就收执，死于洛阳狱。”（第2501页）若是治内的县级长吏违法乱纪，司隶校尉则有权直接将其收捕，关进洛阳狱。《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载李膺“复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第2194页）

3. 外戚。按东汉制度，后妃有罪要被贬入内宫的暴室狱。《后汉书·百官志三》载掖庭令属下有暴室丞，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妇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贵人有罪，亦就此室。”（第3595页）有时他们的亲属也被拘禁于此。如延熹八年（165）二月癸亥汉桓帝下诏废邓皇后，“（邓）统等亦系暴室，免官爵，归本郡，财物没入县官”。^①但是此类事例甚少。东汉自明帝以后，屡次出现外戚把持朝政的局面。如章帝、和帝时之窦氏，安帝、顺帝之际的阎氏，及顺帝至桓帝时的梁氏等。由于他们“专擅威柄，凶恣日积”，^②皇帝若想翦除其势力，需要精心策划，甚至冒险发动政变才能成功。这种行动往往离不开京师治安官员的参与和支持，所以拘捕的外戚多被关进洛阳狱审讯。例如《后汉书》卷23《窦融传》载章帝免除窦穆兄弟官职，“令将家属归本郡，唯（窦）勋以沘阳主婿留京师。穆坐赂遗小吏，郡捕系，与子宣俱死平陵狱，勋亦死洛阳狱。”（第808—809页）和帝逮捕窦宪兄弟，其宾客党羽亦在洛阳狱收审。可参见《后汉书》卷40下《班固传》：“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第1386页）刘保被宦官孙程等人拥立为帝，并收捕外戚阎氏亲属，“诏司隶校尉：‘惟阎显、江京近亲当伏辜诛，其余务崇宽贷。’”^③也反映出他们被关在司隶属下的洛阳狱。桓帝与宦官单超等谋诛梁冀，曾遣“黄门令（具）瑗将虎贲士千人，与司隶共捕冀宗亲洛阳狱，无少长皆诛之”。^④

4. 宦官。东汉中后期，宦官势力在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其担任高级职务犯有罪过者，通常也是由司隶校尉来向朝廷劾奏。例如虞诩永建元年任司隶校尉，遂纠举“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百官侧目”。^⑤《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载桓帝时中常侍左悺、其兄太仆左称聚敛为奸，被司隶校尉韩演举奏，“悺、称皆自杀。”（第2522页）卷54《杨彪传》亦曰：“光和，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彪发其奸，言之司隶。司隶校尉阳球因此奏诛甫，天下莫不愜心。”（第1786页）被批准逮捕的权宦也是送入司隶校尉管辖的洛阳狱。如《后汉书》卷77《酷吏传》载阳球“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习、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及子弟为守令者，奸猾纵恣，罪合灭族。太尉段颍谄附佞幸，宜并诛戮。于是悉收甫、颍等送洛阳狱。”（第2499页）

桓帝时朝政为宦官集团所操纵，他们在宫内建立黄门北寺狱，也关押过一些犯罪的宦官，如《后汉书》卷55《勃海王悝传》所载郑飒、董腾等人。但是，北寺狱不仅设置的时间较晚，拘留宦官的事例也很少，主要还是囚禁反对宦官专权的“党人”。《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言黄巾起事爆发后，中郎将张钧上奏请斩十常侍以谢百姓。“天子以钧章示（张）让等，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洛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第2535页）此事又见《后汉纪》卷24灵帝

① 《后汉书》卷10下《桓帝邓皇后纪》，第445页。

② 《后汉书》卷34《梁冀传》，第1183页。

③ 《后汉书》卷6《顺帝纪》“延光三年十一月壬戌”条，第250页。

④ 《后汉纪》卷21桓帝延熹二年八月，《两汉纪》（下册），第409页。

⑤ 《后汉书》卷58《虞诩传》，第1870页。

中平元年(184):“上以章示十常侍,皆免冠顿首,乞自致雒阳狱,家财助军粮,子弟为前锋。”^①这反映出宦官犯罪入洛阳狱受审是朝廷常制,所以张让等人表示愿意遵守通例,接受朝廷的处治。

综上所述,东汉洛阳狱收容囚犯的范围很广。从史籍记载来看,除皇帝近亲(如犯罪的诸侯王、后妃),以及服侍天子亲眷的宫女,这所监狱几乎可以拘押来自任何社会阶层的犯人。囚犯身份地位异常复杂,反映出洛阳狱在监禁对象方面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同时包含了京师其他诏狱的多种职能。

(三) 建置规模宏大

在京师诸座诏狱当中,洛阳狱的规模引人注目。例如楚王英谋逆案的审理过程中,有许多嫌疑犯与亲属、证人被押送到洛阳狱。如《后汉书》卷81《独行陆续传》载,会稽太守尹兴及属吏陆续等人因受此案牵连,朝廷“乃征兴诣廷尉狱。续与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第2682页)汉代廷尉狱级别较高,不关押爵秩低微之人,所以只收容尹兴,而其他连逮的众多郡吏则被关进洛阳狱。当时京师只有这两座诏狱,其他如若卢狱、黄门北寺狱尚未建立。另据《后汉纪》卷12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载:“楚王英之谋反,诬天下知名者,(焦)贲为河东太守,及楚事遇疫病,道死,妻子闭诏狱,考掠连年。”^②表明刘英在案发之后诬陷国内知名人士,故意扩大事态,搅乱局面。《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传》曰:“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第1430页)因尹兴一人牵涉被捕入洛阳狱的就有五百余众,而同时遭到诬陷的还有许多名士,那么洛阳狱由此而收容的连逮人犯总数又会有多少呢?尽管缺乏具体的记载,但是管中窥豹,通过此例也能看出这所监狱的容量应该是相当庞大的。

《后汉纪》卷10明帝永平十四年记载此案曰:“初,英狱起,内及京师诸侯,外连州郡豪杰,坐死及徙者以千数,而系狱者尚数千人。”御史寒朗奏请明帝核实案情,“上深纳朗言,自幸洛阳寺,出者千余人。”^③此事又见《后汉书》卷41《寒朗传》:“后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第1417页)上述史料说明,当时尚有涉嫌楚王英案件的几千人被囚禁在洛阳狱中,尚未判决。最后明帝亲临录囚,从中释放一千余人。以上记载还反映出下列情况:此时楚王英案件的审理尽管已到后期,许多人被处死或流放,离开了洛阳狱。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洛阳狱关押的涉案人犯要比现在等待判决的数千囚徒更多。而且当时在洛阳狱里关押的囚犯,除楚王英案的涉嫌人众外,还应有司隶校尉、河南尹和洛阳令所审理的其他犯人,例如洛阳境内的普通刑事、民事案犯,京畿和司隶治下七郡的其他重大案犯。如果要估算洛阳狱的容量,应该把他们和因楚王英案而系狱的数千人犯汇集在一起统计。虽然史籍对这所监狱能够囚禁多少犯人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从上述史料来看,至少也能囚禁数千人。

战国以来,由于中央集权国家的逐步形成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政府所设监狱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得到迅速发展。据《越绝书》卷3记载,楚国春申君曾在吴地置大狱,其狱庭“周三里”。^④另据《尉繚子·将理》,当时的监狱规模有小中大之分,“今夫系者,小圜不下十数,中圜不下

① 《后汉纪》卷24,“灵帝中平元年”条,《两汉纪》(下册),第476页。

② 袁宏:《后汉纪》卷12,“章帝元和三年”条,《两汉纪》(下册),第235页。

③ 袁宏:《后汉纪》卷10,“明帝永平十四年”条,《两汉纪》(下册),第188—189页。

④ 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百数，大圜不下千数”。^① 汉代史籍所载情况与此相近，如《后汉书》卷48《应奉传》载其“为（汝南）郡决曹史，行部四十二县，录囚徒数百千人”。（第1607页）即平均每县监狱囚禁数十人，相当于上述的“小圜”。《史记》卷122《酷吏列传》载义纵任定襄太守，“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纵一捕鞠，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第3146页）反映定襄郡治所在的监狱能够容纳数百人，当属于“中圜”的规模。如前所述，洛阳狱至少能够关押数千人，应该是前引《尉繚子》所说的“大圜”。

另外，从狱吏人数的情况来看，汉代普通郡县监狱容量有限，需要的管理人员也不多。据前引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所载，该郡所属各县监狱的“狱史”，每县多者为2人，少者为1人；郡治所在的郾县监狱为5人。东汉洛阳狱由于是京师的诏狱，兼理地方寻常狱讼，囚犯众多，故狱中吏员为数十人。见《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汉官》曰：“雒阳令秩千石”，属下有“乡有秩、狱史五十六人”。（第3623—3624页）这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规模之宏大。

东汉京师其他诏狱受所在地点环境与囚禁对象较为狭窄的影响，收容罪犯的数量有限。如廷尉狱只囚禁秩位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朝内此等公卿大臣不过百余人；两汉十三州号称“百郡千县”，郡国守相亦为百余人，与前者相加，总数也只有数百人，其中犯罪被捕者毕竟是少数，因此廷尉狱没有必要设置很多牢房。《史记》卷122《酷吏列传》载武帝时，“至（杜）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第3153页）司马迁显然认为这个拘押数目对于廷尉狱来说，已经是反常的最高记录了。

若卢狱、掖庭狱、暴室狱和黄门北寺狱都设置在宫内，规模亦不会很大。史书所载，黄门北寺狱囚禁罪犯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容纳数百人。如《后汉书》卷7《桓帝纪》延熹九年（166）十二月载首次党锢之祸，“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并坐下狱。”（第318页）卷8《灵帝纪》建宁二年（169）十月，朝廷再次钩党，“下狱死者百余人”。（第330页）卷67《党锢列传》亦说到这一案件先后被判决的人员总数“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第2188页）在京师容纳囚犯数以千计的大型监狱，应该仅有洛阳狱一所，它可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监狱。

东汉洛阳狱之所以拥有巨大的容量，与光武帝刘秀对监狱制度进行的改革有关。前文已述，西汉京师的诏狱甚多，武帝时中都官狱曾达到二十六所，此外还在关东的洛阳、魏郡、钜鹿设置诏狱。京兆尹和长安令所辖的“长安狱”则是一座纯粹的地方性监狱，只收押“庶狱”案犯。因为京师和关东数郡共有几十所“诏狱”，足以囚禁大量朝廷要犯，无须“长安狱”来协助拘押。而光武帝即位后削减监狱机构，关东的魏郡、钜鹿诏狱被取消，京师的诏狱只剩下廷尉狱和洛阳狱两座。如果发生重大案件，廷尉狱仅收容少数高官显爵之人，而那些原来可以被诸多诏狱容纳的人犯就只能转移到洛阳狱，这应是导致其在东汉时期规模膨胀的主要原因。

四 洛阳狱和东汉后期的政坛斗争

东汉时洛阳狱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引起朝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重视。尤其是汉末的桓、灵二代，皇帝、宦官、外戚、士大夫之间矛盾激化，争斗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洛阳狱管辖权力的控制。

如前所述，洛阳狱的管辖机构同时掌握首都的治安权力，其负责官员——司隶校尉、河南尹和洛阳令控制着京师地区不同层次的司法部门，有权纠举和逮捕各种人犯，特别是司隶校尉

^① 华陆综注译：《尉繚子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8页。

权势极重，朝廷内外无所不纠；同时又拥有武装吏卒，以致被称为“州将”。^①这些兵士平时由都官从事率领缉拿罪犯，遇到紧急情况，则由司隶校尉直接统率出动。例如李膺“率将吏卒破柱取（张）朔”。^②桥玄少子被人劫持，司隶校尉阳球等率士众前来相救，“促令兵进。于是攻之，玄子亦死”。^③既有在京师地区立案、逮捕犯人之权柄，又手握一支军队，故史家称担任司隶就能“虎视帝宇”、^④“四方是则”。^⑤河南尹上能入朝议政，下可临郡治民，其权势虽稍逊于司隶校尉，但亦在伯仲之间。对于那些爵秩较低的仇敌，司隶校尉与河南尹几乎能够任意将其拘捕入狱，甚至先斩后奏。如段颍为司隶校尉，“以礼辟（苏）不韦，不韦惧之，称病不诣。”遂使人诬告其聚众劫夺，“即时收执，并其一门六十余人尽诛灭之”。^⑥前述河南尹梁不疑，因权宦单超、左悺“礼敬小简”，收捕其兄弟送洛阳狱，“二人诣门谢，乃得解。”便是显例。即使是地位尊贵、不能随意逮捕的高官显宦，他们也可以利用职权伺机向朝廷举奏，将其收捕归狱。如首次“党锢之祸”后，中常侍王甫等人依仗权势，气焰熏天。“（阳）球常唾手拊髀曰：‘阳球作司隶，此曹子何得邪？’寻为司隶，明日诣阙谢恩，甫时休下在舍。悉表甫罪，奔车收送洛阳诏狱，自临拷之。”^⑦

参与东汉后期政争者大多具有贵族、官员、名士、宦官等特殊身份以及复杂背景，或为天子所宠幸，或有同党为后援，对他们治罪时常会遇到各方阻挠。如果是通过正常司法程序处理，其过程相当繁琐，且旷日持久。若是重案、要案，皇帝经常命公卿大臣介入审判，实行“杂治”、“朝议”。高级官员涉嫌犯罪的除经过廷尉审理之外，还要由太尉、司徒、司空的“三府”进行覆议案验，然后把拟判意见奏报皇帝审批。冗长的审判过程不仅拖延时间，而且极可能中途生变，首次党锢之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载：“及遭党事，当考实（李）膺等。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第2195页）桓帝听从宦官意见，坚持把党人投入监狱。“太尉陈蕃争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复言。”在野士人贾彪闻讯入京，“说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谡，武等讼之，桓帝以此大赦党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第2216页）

但是，如果控制了京师诏狱，就可以避开审讯、覆议的诉讼程序，不等定罪判决，即在狱中采取各种手段处置政敌，或宣布死者暴病而终，或是受刑不过而终，狱外之人很难确认其真正的死因，监狱管理者也就不会因此而承受严厉的惩处。东汉洛阳狱内曾多次发生过这类事例，如“延熹元年，太史令陈授因小黄门徐璜，陈灾异日食之变，咎在大将军。冀闻之，讽洛阳令收考授，死于狱。”^⑧故金城太守苏谦，“延熹九年入京，（李）膺时为司隶，收谦，诬陷之，死狱中。”^⑨野王令张朔犯罪匿于其兄宦官张让舍，司隶校尉李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⑩阳球光和二年（137）任司隶校尉，“于是悉收（王）甫、（段）

① 《后汉书》卷65《张奂传》，第2142页。

② 《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94页。

③ 《后汉书》卷51《桥玄传》，第1696页。

④ 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册，第160页。

⑤ 《后汉书》卷25《鲁恭传》，第879页。

⑥ 《后汉书》卷31《苏章附不韦传》，第1109页。

⑦ 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下册，第486页。

⑧ 《后汉书》卷34《梁统附冀传》，第1185页。

⑨ 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下册，第661页。

⑩ 《后汉书》卷67《党锢李膺传》，第2194页。

颍等送洛阳狱，及甫子永乐少府萌、沛相吉。球自临考甫等，五毒备极……捶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颍亦自杀。”^①

综上所述，洛阳狱的管辖权与京师地区的司法治安权力密切相连，由于它兼容各种身份的囚犯，其统治机构又有劾奏、逮捕和审判处治的职责，控制了这所监狱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因此司隶校尉、河南尹与洛阳令的职位颇受东汉后期政坛关注，在东汉后期的政治事变中，各派势力试图控制这三个要职，以便在政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桓帝即位时，梁冀外戚集团擅政，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② 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谋诛梁氏，其中一项关键步骤就是任命张彪为司隶校尉，掌握京师最高治安权力。《后汉书》卷7《桓帝纪》载，“（延熹二年）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第304—305页）逼迫梁氏俯首就擒的兵力，主要是依靠司隶校尉的武装吏卒和宫内拼凑起来的千余禁军。卷34《梁冀传》载：“（桓帝）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厖、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第1186页）张彪何许人？以往史家少有关注，笔者注意到有两段史料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后汉纪》卷21“桓帝延熹三年五月甲戌诏”：“汝南太守张彪、故河南尹鲍吉与朕有潜龙之旧，皆封列侯。”^③ 又，《后汉书》卷54《杨秉传》曰：“（延熹）七年，南巡园陵，特诏秉从。南阳太守张彪与帝微时有旧恩，以车驾当至，因傍发调，多以入私。”（第1773页）表明张彪曾是桓帝的故交，关系亲密，因此在事变之前被安排在司隶校尉职位上，以保证翦除梁氏集团行动的成功。

梁冀被诛后，单超等“五侯”擅权，引起桓帝不满，又起用韩寅（演）为司隶校尉来削除其势力。《后汉书·五行志一》曰：“时中常侍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纵其奸匿。海内愠曰：一将军死，五将军出……”^④ 桓帝因日蚀之变，乃拜故司徒韩寅为司隶校尉，以次诛鉏，京都正清。”（第3271页）《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亦载：“司隶校尉韩寅因奏悺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悺、称皆自杀。寅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征诣廷尉。瑗诣狱谢，上还东武侯印绶，诏贬为都乡侯，卒于家。超及璜、衡袭封者，并降为乡侯，租入岁皆三百万，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第2522页）

东汉中期以后，朝内先后有邓氏、阎氏、梁氏等外戚擅权跋扈，与官僚士大夫形成尖锐对立。桓帝诛除梁氏之后，由于宦官权位陡升，而外戚与士大夫相形见绌，为局势所迫，不得不结盟与争斗。^⑤ 灵帝时，先后有外戚窦武、何进与士族官僚联手图谋消灭宦官，同样也采取争取出任司隶校尉和河南尹的策略，试图控制洛阳狱以打击政敌。宦官“五侯”势力消弭后，士大夫集团中威望最高的李膺相继出任河南尹与司隶校尉，屡屡捕杀宦官党羽。前文已述，东汉宦官有罪通常是被关进洛阳狱。在洛阳狱的管辖机构当中，司隶校尉的职位最高，又有劾奏与逮捕宦官的权力，故《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载李膺任司隶校尉后，“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第2194页）

不过，针对外戚与士大夫集团的打压，宦官集团亦调整策略，其中几项内容值得注意。

① 《后汉书》卷77《酷吏阳球传》，第2499—2500页。

② 《后汉书》卷34《梁统附冀传》，第1185页。

③ 《后汉纪》卷21“桓帝延熹三年五月甲戌诏”，《两汉纪》（下册），第412页。

④ 参见于迎春：《秦汉士史》：“尽管士大夫素疾外戚、宦官，但是当宦官问题突出的时候，他们与外戚之间相较和缓的矛盾就暂时被搁置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05页。

第一,建立由宦官直接控制的监狱。东汉后期,宦官虽然“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但是只能在宫内侍奉君主,无法出任公职。司隶校尉由于职权甚重,一直受到外戚和官僚士大夫们的觊觎。自东汉和帝倚靠众诛灭窦氏至党锢之祸以前,尽管宦官势力在不断壮大,却不能出任这一职务,也未将司隶校尉或河南尹掌握在自己亲信手里。洛阳狱又设在宫外,不便宦官集团操纵。如果能在宫中就近设置一所诏狱,由宦官集团直接管理,则不受旁人掣肘。出于这种目的,桓帝时,在宫内宦官治事的官署建立了黄门北寺狱,将反对宦官专权的要犯囚禁于此。黄门北寺狱设立后,宦官集团亲自把持部分司法机构和审判权力,从而在政坛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陈蕃、李膺、杜放等多名“清流”士大夫在北寺狱被害。如马端临所言:“汉自桓灵以来,有黄门北寺狱,是宦者得以专刑也。故穷捕钩党,剿戮名士,皆黄门北寺狱之所为也。”^①

第二,尽力将政敌逐出京师司法治安机构,以减少自己遭受逮捕及在洛阳狱中被害的可能性。如李膺任司隶校尉后捕杀宦官党羽术士张成,侯览等人即指使其弟子上书诬告:“司隶李膺,御史中丞陈翔、汝南范滂、颍川杜密、南阳岑暄等相与结为党,诽谤朝廷,迫胁公卿,自相荐举。”^②唆使桓帝将其撤职下狱,由此掀起逮捕党人的风潮。另外,自安帝时起,执政的外戚往往将河南尹一职掌握在自己家族手里。如安帝时邓太后临朝,即任命堂弟邓豹为河南尹。^③顺帝时梁商为大将军,其子梁冀任河南尹,并先后以门客吕放、吕禹兄弟为洛阳令。梁商死后,梁冀任大将军,又陆续由其弟梁不疑、其子梁胤为河南尹,前后长达23年。^④桓帝立邓氏为皇后,其从父邓万世随即出任河南尹。^⑤延熹八年(166)桓帝废邓皇后,将邓万世等下狱处死后,河南尹职位不再由外戚担任。从当时桓帝对宦官集团的信从程度来看,这项政策的出台可能是他们在幕后操纵的结果。

第三,设法以亲信出任司隶校尉,借以控制洛阳狱和京师的司法治安机构。首次党锢之祸爆发后,随着李膺罢官入狱,司隶校尉一职开始为宦官的亲属亲信陆续担任。《后汉书·五行志一》载:“桓帝之末……于时中常侍管霸、苏康憎疾海内英哲,与长乐少府刘嚣、太常许咏、尚书柳分、寻穆、史佚、司隶唐珍等,代作唇齿。”(第3283页)唐珍即为中常侍唐衡之弟。^⑥此后,这一职务又由宦党史佚继任。《后汉书·五行志一》李贤注:“(史)佚后亦为司隶。应劭曰:‘史佚,左官嫚进者也’。”(第3283页)桓帝末年,又将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推上这一职位。^⑦

灵帝即位后任命窦武为大将军,建宁元年(168),窦武与太傅陈蕃等联合士大夫集团谋诛宦官,所采取的重要方略,一是打入宦官集团内部,控制黄门官署和北寺狱。东汉后期宦官擅政,黄门令的权力明显扩大,统领禁内宦者,有权举奏和缉拿其中不法之徒。如桓帝与单超等谋诛梁冀时,“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黄门令)具璽敕吏收恽,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⑧宦官集团内部亦有尖锐的矛盾,外戚、士大夫们则利用了这一点,努力使附己之人担任黄门令,以便掌握北寺狱和黄门官署。如窦武、陈蕃谋诛宦官时,即“奏免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7《职官考十一·内侍省》,第520页。

② 袁宏:《后汉纪》卷22《桓帝延熹九年》,第430页。

③ 参见《后汉书》卷16《邓禹附鹭传》,第617页。

④ 参见万斯同:《东汉九卿年表》,《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68—672页。

⑤ 参见《后汉书》卷10下《桓帝邓皇后纪》,第445页。

⑥ 《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注引《续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9页。

⑦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续汉书》:“嵩字臣高。质性敦慎,所在忠孝。为司隶校尉。灵帝擢拜大司农、大鸿胪,代崔烈为太尉。”(第2页)

⑧ 《后汉书》卷34《梁冀传》,第1186页。

黄门令魏彪，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无状者长乐尚书郑飒，送北寺狱”。^①而曹节、朱瑁等人发动事变时，也是首先更换黄门北寺的主官，重新控制这所监狱。^②二是窦武、陈蕃“以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③藉此控制京城，但因计划泄露被宦官挫败。曹节、王甫等权宦抢先发难，立即更换外戚、官僚士大夫们安插的京师治安、行政长官。《后汉书》卷23载：“（灵帝建宁元年）九月辛亥，（曹）节请帝御前殿，召公卿百官，易拜司隶校尉、河南尹，遣中谒者分守南、北宫。”^④杀死窦武、陈蕃之后，发动第二次党锢。此后，宦官势力又控制司隶校尉一职，出任此职的党羽有王寓、^⑤段颎和刘嚣。^⑥由于得到宦官集团的强力支持，段颎是桓、灵二代出任司隶校尉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在熹平元年继刘猛担任此职后，次年升任太尉，“其冬病罢，复为司隶校尉”，^⑦前后共达四年之久，竭力为宦官集团清除异己、逮捕政敌，甚为得力。^⑧

黄巾起事后，朝内政治形势逐渐有利于外戚、士大夫集团，皇后之父何进出任大将军，其弟何苗担任河南尹，在士族官僚袁绍等人的支持下，何氏集团着手消灭宦官势力。灵帝死后，统领禁军的权宦蹇硕疑不自安，欲发动事变诛灭何进兄弟。而中常侍郭胜“亲信何氏，遂共赵忠等议，不从硕计，而以其书示进。进乃使黄门令收硕，诛之，因领其屯兵”。致使蹇硕的图谋破产。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次事变里，黄门令这一官职已为外戚所控制，所以能够听从何进的命令逮捕蹇硕。此后，朝内两大政治派别的冲突迅速激化，何进与士族官僚谋诛宦官的重要策略之一，仍是保举其得力亲信担任京师最高治安、行政长官，“以（袁）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积极谋划发动事变，拘捕宦官。但事机败露，张让等宦官诱杀何进后进行反击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伪造诏书，任命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两个官职，“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⑨最后双方兵戎相见，袁绍等率众攻进皇宫，剿灭群宦及其党羽。《后汉书》卷8《灵帝纪》记载了这场决战的情况，“司隶校尉袁绍勒兵收伪司隶校尉樊陵、河南尹许相及诸阉人，无少长皆斩之。”（第358页）从中可见这两大阵营对京师诏狱和治安权力的激烈争夺。

〔作者宋杰，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100037〕

（责任编辑：宋 超）

① 《后汉书》卷69《窦武传》，第2243页。

② 《后汉书》卷69《窦武传》：“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冰疑，不受诏，甫格杀之。遂害勋，出郑飒。还共劫太后，夺玺书。”（第2243页）

③ 《后汉书》卷69《窦武传》，第2243页。

④ 《后汉书》卷23“灵帝建宁元年”条，《两汉纪》（下册），第444页。

⑤ 《后汉书》卷65《张奂传》：“司隶校尉王寓，出于宦官，欲借宠公卿，以求荐举，百僚畏惮，莫不许诺，唯奂独拒之。”（第2141页）

⑥ 段颎任司隶校尉事见《后汉书》卷65《段颎传》，第2153—2154页。《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注引《风俗通义》曰：“司隶刘嚣，以党诸常侍，致位公辅。”（第179页）

⑦ 《后汉书》卷65《段颎传》，第2154页。

⑧ 《后汉书·五行志一》载，灵帝即位后以刘倭为侍中，“中常侯览畏其亲近，必当间己，白拜倭泰山太守，因令司隶迫促杀之。”（第3383—3384页）《后汉书》卷78《宦者曹节列传》载，熹平元年，有人在朱雀阙上题书斥责宦官，司隶校尉段颎“乃四出逐捕，及太学生游生，系者千余人。”（第2525页）皆是其例。

⑨ 《后汉书》卷69《何进传》，第2248、2250、2251页。

CONTENTS

Research Articles

Present-Day Puyang in Henan Province Is the Cradle of the Xia People: An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 SHEN Changyun (4)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have revealed an ancient city cluster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in present-day Puyang, Henan Province, the center of the ancient He-Ji (Yellow River and Jishui River) area. This provides evidence that Puyang was the Yangcheng of ancient records, Yu's (禹) capital city. During the Yangshao and Longshan period, the area covering present-day eastern Henan and western Shandong witnessed a rapid growth of settlements and particularly of ancient cities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suggesting that the Xia people headed by Yu (禹) thrived in this area. In contrast to the growth and prosperity of the settlements in the ancient He-Ji area, those in the neighboring areas such as western Henan and Guanzhong experienced a decline. That, together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consequent changes in population structure, suggests that a densely populated and prosperous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took shape in the ancient He-Ji area during the time of Yu (虞) and Xia.

Luoyang Priso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SONG Jie (17)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Luoyang Prison was located inside the county government office, and was administered jointly by the *si li xiao wei* (metropolitan commandant), *yin* (prefectural magistrate) of Henan and *ling* (county magistrate) of Luoyang. Large in size and with a complex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Luoyang Prison accommodated prisoners sentenced both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by local governments, whose status ranged from aristocrats and officials of various ranks to ordinary people. The prison hence constituted one of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curity of the capital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imperial court. The fierce struggle over the control of Luoyang prison contributed much to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Tang Copies of Poems by Yuan Zhen and Bai Juyi Were Not Made Using Woodblock Printing

XIN Deyong (36)